

中非大使学者共同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编者按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所在；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价值追求、理论指导、战略支撑、外部环境、力量来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七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意义重大，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引发热烈反响。非洲各界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本刊特邀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查纳卡、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等 8 位中非大使、专家学者撰文，深入学习领悟“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友好交往，展望中非友好合作未来发展，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党际交流与合作：以埃塞俄比亚为视角^{*}

[埃塞俄比亚] 特肖梅·托加·查纳卡/文 卫白鸽/译

引言

1921 年 7 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2021 年 7 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开始执政，至今已超过 70 年，这在世界政党史上十分罕见。我们有时会听到西方国家对一国政党和领导人长期执政的妄议性言论，并以此作为所谓“民主”的标准。然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只要所制定的制度能够达到人民的预期效果，国际社会就有义务尊重该国人民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正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百年华诞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回顾上个世纪的艰难奋斗历程提供了机会，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展望新征程的平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科技强国，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14.7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①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成功使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贡献率达 70% 以上，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②这不仅对中国而言具有历史性

* 作者简介：特肖梅·托加·查纳卡（Teshome Toga Chanaka），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北京 100600）。本文所表达观点仅属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埃塞俄比亚政府或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的观点。

译者简介：卫白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45）。

① David Monyae and Sizo Nkala, “A Century of Progress,” *China Daily*, April 16, 2021,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4/16/WS6078daf4a31024ad0bab5e7e.html> [2021 - 08 - 02].

②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 April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2021-4-6/FullText.pdf> [2021 - 08 - 03].

意义，而且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国伟大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为人类减贫与发展探索了新路径，向世界展现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精神。

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此开启了走向繁荣富强的征程。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和脱贫攻坚战注入新动力。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直至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减贫奇迹”，成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典范，并且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平台，与其他国家分享减贫经验，加强减贫交流与合作，给这些国家实现减贫与发展有很大启示和帮助。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流合作

一个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除了国内斗争外，还要与外国侵略作斗争，与错误的、敌对的意识形态作斗争，与绝对贫困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许多进步政党、“自由战士”和独立运动人士建立了强有力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间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①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非洲各国正处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非洲国家宝贵援助，还在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方面给予非洲国家重要支持。到 1988 年，已有 40 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际交往。到 2012 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非洲国家政党数量增至 81 个。通过加强政党交流与合作，不仅为推动非中和谐的党际关系和政府层面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非洲政党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发挥了主导作用。

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当年非洲国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

① Zhong Weiyun, “Inter-party Relations Promote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Today*, October 19, 2012, http://www.chinatoday.com.cn/english/report/2012-10/19/content_490616.htm [2021-07-20].

国的合法席位给予有力支持。对此，毛泽东主席曾说“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这句话是非中友好的生动写照。非洲和中国历来患难与共，相互支持，这是非中友好合作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与许多非洲国家政党组织保持友好密切联系，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坦桑尼亚革命党（CCM）、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组织（NRMO）、卢旺达爱国阵线（RPF）等。

以党际交往为促进，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多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工业园区、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合作，开展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等项目，助力非洲经济社会进步，助推非洲减贫事业发展。我们相信，今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流合作将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埃塞俄比亚的友好关系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相距遥远，但是历史上两国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在共同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结下深厚友谊。1935 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中国人民坚定地同埃塞俄比亚人民站在一起，广泛声援、极大鼓舞了埃塞俄比亚反意斗争，谱写了现代中非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深深铭刻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记忆中，成为埃中关系的情感基础和重要支柱。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于 1970 年 11 月 24 日建交。两国保持长期友好，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两国在贸易投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现代教育等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埃塞俄比亚投资兴业，促进当地发展，惠及民生。中国在事关埃塞俄比亚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些重要领域提供宝贵援助和支持，迄今已建成了公路、发电站、供水工程、兽医站等 30 个成套项目。从 1974 年起，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医疗队，40 余年从未间断。

1991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推翻门格斯图政权，成为埃塞俄比亚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两党都是各自国家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有相似之处，面临着领导国家和人民谋发展的共同任务。埃革阵及其精英们深受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强大组织领导力的鼓舞，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把党的建设和农村发展作为党际交流的重要领域。

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他在 2012 年去世前一直是埃革阵主席）曾说，埃中关系有三根支柱，分别是政府关系、政党关系和人民关系，其中

政党关系是埃中关系的灵魂和基础。^① 两党都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为奋斗目标，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外国势力干涉本国内政。

2017 年，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中国是埃塞俄比亚主要的贸易伙伴、发展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埃塞俄比亚是最早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之一。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亚吉铁路及沿线工业园等项目，既是埃中务实合作的成果，也是埃中友谊的见证。

2019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取代埃革阵，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埃中双方患难与共，相互帮助，团结抗疫。2020 年 6 月，阿比总理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两国、两党友谊经受住了疫情考验，未来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埃塞俄比亚繁荣党主席、政府总理阿比致函习近平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党交流与合作，共同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期间，繁荣党高层领导还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旨在加强与中国共产党交往合作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合作过程中，繁荣党（埃革阵）积极探索并找到了适合埃塞俄比亚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埃塞俄比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阿比政府出台了未来十年发展规划，旨在到 2030 年使埃塞俄比亚从以农业为主向工业化转变，从低收入国家跻身为中等收入国家，将埃塞俄比亚打造成为非洲的繁荣灯塔。在埃塞俄比亚谋求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始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无论“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埃中传统友谊和务实合作必会继续走深走实。双方将充分用好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平台，更好地实现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埃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结 论

党际关系在引领和塑造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与许多非洲国家政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和非洲国家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秉持共同或共享的理念，在国际事务上有相通

^① Zhong Weiyun, “Inter-party Relations Promote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Today*, October 19, 2012.

或相似的立场。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和中非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中非党际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加强，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目前，全球正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这一严峻时刻，我们更应鼓励和加强中非党际交流，共同应对此次世纪疫情的挑战，谋求共同发展。

延安精神与中津全天候友谊^{*}

[津巴布韦] 劳斯顿·姆卡罗/文 卫白鸽/译

2019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来自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塞拉利昂、赞比亚、乌干达等 9 个非洲国家的 12 名专家学者应邀访华，笔者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随非洲学者访华团前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登临宝塔山，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延安精神的强大力量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感召启示意义。非洲学者访华团还走进延川县梁家河村，聆听梁家河故事，追寻中国领导人成长的足迹，从一个小乡村看中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次中国之行尤其是延安之行给所有非洲学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回国后也在思考津巴布韦的独立与发展道路，在思考延安精神可以给津巴布韦乃至非洲带来哪些启示。

对延安精神的理解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培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斗争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逐渐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辉煌胜利，并且从延安走向全中国，由此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支撑。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实地走访以及同

^{*} 作者简介：劳斯顿·姆卡罗（Laston Mukaro），津巴布韦大学人文学院高级讲师，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哈拉雷）。

译者简介：卫白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45）。

中国专家学者官员座谈，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到延安精神的内涵。

一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这是充满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的精神，要求我们一起从实际出发，探寻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仅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西方用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既有特定历史背景，符合时代要求，也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不可能墨守成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既保持了连续性，又保持了创新性。与此相适应，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大政方针、政策举措同样都既保持了连续性，又保持了创新性。不论国家领导人如何更换，政府如何换届，国家发展一如既往，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创新性，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和营商环境稳定。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能比的优势。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立党之初，其初心和使命就一直没改变，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并自始至终认真实践。人民至上，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发展为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而且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发扬光大。

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年轻时曾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梁家河村工作生活了7年。他扎根于乡村，扎根于基层，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同甘苦，与人民共同奋斗。他深知人民疾苦，知道人民在想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这一经历对于后来习近平主席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和塑造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① 这一论断揭示了党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党为人民服务，人民跟党走。

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奋斗。他表示“我们要实现党的十

^①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o. Ltd, 2014, p. 403.

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① 在中国，“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绝不是空话，更不是执政党的宣传口号，而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身力量，艰苦奋斗就是在困难环境中努力拼搏，唯此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发展成就也是靠艰苦奋斗得来的。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铸就了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丢弃这一光荣传统，而是继续奉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奉行艰苦奋斗精神，习近平主席强调“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② 中国有 14 亿人口，比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口还要多，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对中国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非洲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也是为全球减贫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延安精神对非洲也很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从延安精神中学到很多。非洲也需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非洲也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正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而不仅仅是作为政党的竞选口号来喊喊而已。非洲也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必须明白非洲的发展必须依靠非洲人民自己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而不是依赖外来援助。当然，延安精神对非洲的启示远不止这些。

延安精神与巴布韦民族解放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延安精神与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非洲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是一致的、相通的。非洲国家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

①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p. 403.

② Xi Jinping, “Speech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21, pp. 1 – 2.

均曾遭受殖民压迫和剥削。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中非相互支持，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双方结下全天候、兄弟般的友谊。津巴布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津中友谊在历史上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历久弥坚，是中非友好的一个典型代表。

津巴布韦在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后，于1980年获得独立。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津巴布韦积极从外部世界汲取智慧与力量，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远在非洲大陆的津巴布韦还处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之中。津巴布韦，当时还被称为罗得西亚——以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名字命名的，是1884—1885年柏林会议殖民列强瓜分非洲的产物，帝国主义阴谋奴役非洲人民，破坏非洲文明。

在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等老一辈革命者的领导下，津巴布韦人民发起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同于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坦噶尼喀、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它们都是直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而津巴布韦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的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众多白人殖民者都以罗得西亚为家，至少有1/3的白人除了罗得西亚以外，其他地方无家可归。”^①因此，这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极为顽固。在长期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都无法撼动种族主义统治之后，武装斗争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最后的选择。为了实现解放和自由，津巴布韦人民除了拿起武器，已经别无选择。津巴布韦由此进入了第二次“奇穆伦加”（绍纳语，意即“解放斗争”）阶段。

中国为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从道义上、思想上、军事上都提供了宝贵支持。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然后运用到津巴布韦的解放事业中，也搞起了游击战，或者说“丛林战”。多批游击战士被送往中国接受军事培训，其中包括现任总统埃莫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以及后来成为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军司令的约书亚·通戈加拉（Josiah Tongogara）。除了到中国接受培训以外，还有大批游击队员在坦桑尼亚境内接受了中国军事教官的培训。

当时津巴布韦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士兵之歌》（绍纳语：Nzira dzemasoja）在这首歌中，津巴布韦自由战士们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所提供的宝贵支持。这首歌还提到了军民鱼水情，游击战士是鱼，人民群众是水，要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就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这也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延安精神传到了非洲，传到了世界。

^① Leonard T. Kapungu, *Rhodesia: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New York: Obis Books, 1974, p. 114.

延安精神与中津友好合作

中国与津巴布韦长期友好，两国于 1980 年 4 月 18 日津巴布韦独立当天建交。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2015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2018 年 4 月，姆南加古瓦总统访华，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为津巴布韦提供了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国家体育馆、马胡塞夸医院、农业示范中心、干旱地区打井、中津友好中学和小学、国家高性能计算机中心等项目。津巴布韦议会大厦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建成后将成为首都哈拉雷的地标性建筑。中国长期向津巴布韦派出农业专家组和医疗队，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中国为津巴布韦多个建设项目提供优惠融资。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容、维多利亚瀑布国际机场等标志性项目已经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旺吉火电站扩容项目、穆加贝国际机场扩建项目还在建设中。这些项目有利于促进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

中国是津巴布韦的重要贸易伙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中津贸易额仍然保持增长，达 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这在疫情背景下是很大的成就。津巴布韦主要向中国出口烟草、铬铁和其他矿产品，从中国进口轻工业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 2019 年底，津巴布韦吸收中国投资存量为 19 亿美元，涉及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其中较为知名的项目有中钢集团铬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建材水泥和建筑用砖生产、阳光易丰陶瓷和瓷砖制造等，为当地带来了就业，创造了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文交流方面，两国在文化、教育、媒体、智库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2007 年 3 月，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成立，至今运行发展良好。中国政府奖学金涵盖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等各个层面，使许多津巴布韦青年学子有机会到中国留学，为津巴布韦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笔者本人就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受益者。

津巴布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方。该倡议对于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连通内陆和沿海国家、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就像一块互利合作的“蛋糕”，津巴布韦将全方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将这块

“蛋糕”越做越大。

津巴布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勇敢的人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津巴布韦政府制定了《2030年愿景》，以期实现到203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恢复“南部非洲面包篮子”的目标，还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投资便利，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津巴布韦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发展经验，来助力我们实现惠及民生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如前文所言，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津巴布韦正在为实现《2030年愿景》而努力，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带一路”倡议将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在一起，助力两国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携手共进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领导力^{*}

[尼日利亚] 班沃·阿戴特罗·奥拉尼伊/文 凌荷/译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已是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百年大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早期斗争，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非洲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较晚，毛泽东思想传到非洲后，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国家直接学习中国的游击战术，开展武装斗争，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努力推进工业化。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发展一度受到干扰，出现了艰难和曲折。此后，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重新回到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开始推行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一直持续至今。

^{*} 作者简介：班沃·阿戴特罗·奥拉尼伊（Banwo Adetoro Olaniyi），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讲师（拉各斯）。

译者简介：凌荷，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编辑（北京100101）。

2021 年, 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一百周年。100 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独立与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面建成能够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的小康社会,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一系列不断提升。一些非洲国家提出“向东看”政策, 这个“向东看”主要就是看中国, 通过学习中国发展经验, 加强与中国合作, 实现自身发展繁荣。

如今人们在大谈“良治”和“领导力”。我们知道, 领导力是实现良治的关键。中国是当今世界良治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则是强大领导力的典范。那么,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具备、如何增强、如何发挥这种领导力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领导力的性质和定义进行了诸多阐述。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将政治领导力分为地方、国家和全球层级, 并将其视为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① 约瑟夫·马修利 (Joseph Masciulli) 等人将政治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组织动员追随者, 从而使追随者听从和接受领导的能力。^② 瓦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和博特·纳努斯 (Burt Nanus) 将领导者的角色解释为一个组织的愿景创造者, 而愿景代表了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③ 詹姆斯·伯恩斯 (James Burns) 在其《领袖论》一书中提出了变革型领导力理论。^④ 变革型领导力是指领导者适应形势变化和时代变革要求, 引领并激励追随者, 把握历史机遇, 应对各种挑战, 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共同目标代表着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的价值和动机、愿望和需求、追求和预期, 旨在建立更好愿景, 追求更高理想, 实现更大价值。变革型领导力强调将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结合起来, 致力于推动组织变革和社会变革, 从而让追随者受益, 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变革型领导力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 并且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但是, 令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感到困惑的是, 它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这是因为, 西方政党政治以选举为中心, 以获取政权为主要目标, 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二者有根本不同之处。从 1921 年成立至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其领导力来源于人民,

① Joseph S. Nye, “New Models of Public Leadership”, in Frances Hesselbein, Marshall Goldsmith and Iain Somerville (eds.), *Leading Beyond the Walls: How High-Performing Organizations Collaborate for Shared Succes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1.

② Joseph Masciulli, Mikhail A. Molchanov and W. Andy Knight,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Context,” in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23-48.

③ Warren Bennis and Burt Nanus, *Leaders: Strategies for Taking Char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④ James MacGregor Burns,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服务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领导力体现在一系列根本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理念中，勾画出其带领中国人民要实现的美好愿景和长远目标。从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但均具有连续性和创新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中国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指导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列出“十四项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①这十四项坚持中，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就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领导力体现在其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领导力特质息息相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共产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了多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是，随着形势和条件变化，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难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于是决定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农村地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利用国外资源、市场和技术，服务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开放视为领导国家走向强大的“灵丹妙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

①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o. Ltd., 2020, p. 8.

② Xi Jinping, “Speech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21.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看到了消除贫困的希望，看到了实现发展的不同道路选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力还体现在其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倡导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带一路”倡议（BRI）。该倡议是现代基建历史上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大发展规划。^①其主要特征是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基建、贸易、融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区域乃至全球互联互通，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习近平主席这样描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②该倡议不仅着眼于发展领域，而且非常重视人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这也是当今世界不同种族民族、不同语言文化的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共处所极为需要的。

“一带一路”倡议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发展机遇。该倡议中的铁路、高速公路、电信、电力等基建项目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让许多国家有更多机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交通运输时间，促进贸易与投资，增加收入，减少贫困。据估计，经济走廊建成后，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时间可最多缩短 12%，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时间将平均缩短 3%。“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贸易增幅将在 2.8% 至 9.7% 之间，世界贸易增幅将在 1.7% 至 6.2% 之间。由于交通互联互通，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大幅增加 7.6%。大多数沿线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会增加，最高增幅可达 3.4%，从而帮助 760 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低于 1.90 美元/天）和 3200 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低于 3.2 美元/天）。^③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使沿线经济体受益，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一带一路”倡

① Christopher K. Johns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8, 2016.

② Xi Jinping,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Xinhuanet*, May 14,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5/14/c_113628298_2.htm [2021-07-08].

③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2019, Foreword, p. xiii,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15511560787699851/Main-Report> [2021-07-10].

议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深化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的卓越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领导力还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中国梦”由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底提出，此后又多次进行阐述，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与我们非洲人倡导的“非洲复兴”有共通之处。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①“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而且必须依靠人民来实现，广泛而又积极地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负有领导责任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使命，也是无比重大的历史责任。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实现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追随者（人民）的意愿和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富裕。这其实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相通的梦想，包括诸多非洲国家在内。

总之，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都宣称“以人民为中心”，但有的可能只是竞选纲领，而中国共产党从理念到实践，都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笔者曾有幸随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非洲学者访华团深入延安革命圣地，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源、思想内涵和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核心的、根本的执政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重要保证。

中非政党交往：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钟伟云

埃塞俄比亚政府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生前曾常对到访的中国客人说，埃中关

^{*} 作者简介：钟伟云，中联部四局前局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60）。

^①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o. Ltd, 2014. p. 43.

系有三根支柱，即政府关系、政党关系和人民关系，其中政党关系是灵魂和基础。梅莱斯的话，道出了中非关系的本质。如果说中非关系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党际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党际关系是中非关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悠久的交往历史

中非政党交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关心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命运，积极支持其开展反殖民主义独立斗争。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奉行只与同类政党发展党际关系的原则，以党的名义发展关系的非洲政党仅有南非共产党、留尼汪共产党以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刚果（金）的卢蒙巴主义党等少数政党。但在那个时代，非洲许多民族解放组织先后派代表团访华，寻求新中国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或来中国接受政治和军事培训。这些代表团虽系应中国民间组织邀请而来，但它们有机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接触，加上邀请它们访华的中国民间组织本身又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非洲民族解放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于那个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只与同类政党发展党际关系的方针，开始与非洲其他类型政党发展党际关系，中非党际交往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执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非洲的“多党民主”浪潮对中非党际交往产生了一定影响。但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非洲“多党民主”风潮逐渐消退，中非政党交往得以恢复，中国共产党与一批新上台的政党建立了关系，与老执政党的交往也得重启。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非党际交往快速发展，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一方面，非洲国家政治局势渐趋稳定，新上台的政党逐渐站稳脚跟，一批老党也巩固了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对非洲国家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吸引力，非洲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展交往的愿望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中非党际关系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除双边交往外，中非政党间还建立了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等多边交流机制。一个既适合当今非洲政党政治形势，又符合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需要，以各国执政党为主要对象，兼顾参政党和在野党，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非政党交往格局已基本形成。中非政党交

往成为中非高层政治交往的一条重要渠道、中非加强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和中非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载体，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为中非各自革命与发展事业服务

中非党际交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前中非党际交往主要着眼于服务于革命任务的话，那么新时期中非党际交往的最突出特征则是共谋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验交流日益走向深入。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政党纷纷提出要求，希望派干部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为此，中国共产党专门设立了非洲政党干部来华考察研修项目。通过这类项目，每年都有数百名非洲政党干部来华，与中国党政部门、研究机构、培训机构、厂矿企业、农村社区等进行广泛的接触，听取有关专家和官员的介绍，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做法与经验。交流的主题非常丰富，既有党建、经济发展、扶贫，也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等。应一些非洲政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还派专家前往非洲，通报中国的有关情况。

应非方要求，中国共产党还特别为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执政党的高级干部举办专题研讨班。许多在任的非洲政党领导人都曾以这种方式来华研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曾于 2009 年率非国大全国执委研修班访华，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非国大建党时间长但执政时间短，中共已经执政 60 年，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愿意进行双向式的学习交流。研修班开班以来，大家认真学习，深入讨论，收获很大。”

在 2021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在短短 8 分钟的发言中，对中国共产党基层工作经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给上万名通过网络与会的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和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南非非国大前总书记曼塔谢也常常以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教育非国大干部。这些都表明中非政党经验交流产生了良好影响。

二是促进中非务实合作。党际关系并非空谈，在交流经验、增进感情的同时，也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做了不少实事。在地方任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率团出访非洲时，往往都把促进相关地方的对非合作作为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在接待非洲政党代表团访华时，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参访有关企业，

促成了不少合作项目。可以说，中非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也有党际关系的一份功劳。

三是在国际斗争中相互支持。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总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特别是，每当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责难、围攻时，非洲政党总是及时给予有力声援，无论是在台湾、香港、涉藏、涉疆、人权问题，还是前些年的“南海仲裁案”和近期的新冠肺炎病毒溯源问题上，都可听到非洲政党支持中国的声音。这种支持彰显了中非政党友好团结的真挚情感。

中非党际关系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中非党际关系经历了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说是历久弥新、历久弥坚。它之所以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归结起来有几条。

一是中国共产党和非洲政党在引领国家发展中负有相同使命，双方志同道合、志趣相投。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发展同非洲政党关系来了解非洲、研究非洲，与非洲政党高层进行战略沟通。非洲政党需要通过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学习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动与中国的合作。双方都有深化关系的强劲动力，这决定了中非党际交往有着深厚的共同基础。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政党打交道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70 年来，尽管中国形势和非洲各国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平等对待非洲政党，尊重它们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从不以大党老党自居，不居高临下，不当教师爷，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只有尊重别人，才能换来别人的尊重。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党际关系。

三是中国共产党主动站在非洲政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急它们之所急，想它们之所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它们。中国共产党虽做不到有求必应，但心意的表达是真诚的，因而能够得到非洲政党理解和报答。前些年，南部非洲六国执政党决定在坦桑尼亚建设一个联合培训机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它们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中方与六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相信该学院的建成和运行，将为深化中非党际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中非友好合作，坚持发展为先^{*}

周欲晓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百年中，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四大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穷二白、一盘散沙的局面；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去年，中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 万美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是因为她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先进的理论指导、强大的领导力和不断自我革命的决心。此外，还有一条更加具体的宝贵经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因为她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并为摆脱贫困而奋斗不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革命领袖毛泽东曾在延安提出了家喻户晓的“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他所倡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极大改善了当地军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解放区的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日后中国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发挥了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解放后，中国政府为摆脱贫困而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

^{*} 作者简介：周欲晓，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曾任中国驻利比里亚、赞比亚大使（北京 100020）。

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打赢了减贫攻坚战，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5 亿，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第一个百年“中国梦”。

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为那些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持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非洲国家自然和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各国都取得了政治独立，谋求发展的愿望极为迫切，治国理政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只要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非洲国家也一定能实现“非洲梦”。

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始终突出发展主题。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不忘发展援助，无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时首次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为早期的中非合作和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以后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习近平主席就任和连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均选择了非洲，提出对非合作的“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利义观。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 2015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和 2018 年北京峰会上分别宣布，向非方提供各 600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用以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为实现共同发展，中非领导人还在北京峰会上决定，共同推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开展南南务实合作的典范。历次论坛会议所制定的合作举措都旨在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减贫，许多合作措施，如援助、投资、贷款、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债务免减、减贫政策咨询、减贫经验分享、能力建设、提供奖学金、职业技能培训等，都为发展和减贫而量身打造，并逐步由“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型升级。

在落实合作举措过程中，中国始终认真贯彻真实亲诚理念，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在疫情形势下，中国连续第 12 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对非直接投资保持平稳发展，众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非洲坚守岗位，1100 多个合作项目坚持运行，为非洲国家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中非“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目前，北京峰会“八大行动”整体落实率超过 85%，600 亿美元配套资金有 70% 多已投入使用或做出安排，免除了 15 个非洲国家的到期债务，一大批合作项目正落地生根。

中国参与建设了非洲许多项目，比如铁路、公路、桥梁、大坝、电站、高压输电线、通讯网络、工业开发区、各类工厂、农业示范农场、医院、抗疟中心、住宅小区、办公大楼等，这些项目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发挥着重要

积极作用。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走出去”经验，受益颇多。中非双方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珍视与非洲的友谊与合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从事对非外交 40 年，全过程参与中非合作论坛筹建和成长的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刘贵今大使成为“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之一，这是中国外交人员迄今为止获得过的最高荣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视。

今年是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年，目前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双方正在探讨制定《中非合作 2035 愿景》，旨在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确立中非务实合作的目标和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曾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责任，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贡献，为人类减贫进程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必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中非合作论坛必将为中非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与非洲友好世代相传^{*}

程 涛

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篇章。在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以及巩固政治独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非洲有力的支持和真诚的援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非洲老一辈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加纳的恩格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马里的莫迪博·凯塔、前扎伊尔的蒙博托、纳米比亚的努乔马、加蓬的邦戈等许多领导人都成为中国的好朋友。

我从事多年的对非洲工作，特别是在常驻加蓬、贝宁、马里和摩洛哥期间与驻在国的领导人接触较多，更亲身感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

^{*} 作者简介：程涛，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曾任中国驻马里、摩洛哥大使（北京 100020）。

马里领导人对中国的友好代代相传

马里在刚刚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马里开国元勋莫迪博·凯塔总统就是中国的铁杆朋友。马里领导人对中国的友谊一直得以传承。在常驻马里期间，我有机会与时任总理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他的中国情结的确深深地感动了我。

凯塔是马里政坛元老。我到任不久就陪同他来中国正式访问。他曾多次到过中国，此次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感慨良多。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拜会凯塔总理时那非常独特和亲切友好的场面。一见面，总理就开玩笑地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主义者”。20 世纪 60 年代在非洲学联时就到过中国，从那时就爱上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至今不变。他还背诵了一段法语版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又用中文唱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字正腔圆。在马里任职期间，我经常应邀去凯塔总理家做客聊天，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和凯塔都是 1945 年出生的，同龄人之间的感情可能更容易沟通。他说，从我们的交往中汲取了许多东方的知识和智慧。

1999 年凯塔总理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推心置腹的谈话以及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让他感受到“真正的兄弟情谊”。在深圳访问时，中方安排凯塔总理在世界公园里种一棵象征友谊的树，并且在树下立了一块刻有他职位和名字的石碑。当他看到周围树前立的许多石碑上都写着大国首脑的名字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他非常激动地说“只有你们看得起我们，我真正感受到你们‘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政策’不是停在口头上”。

2010 年 8 月，在法国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研讨会。参加会议有法国的内阁成员、议员、外交官和学者，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官员和学者 500 多人。会议的组织者是法国前总理、法国参议院第一副议长拉法兰。我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被邀请参加会议，做主旨演讲并回答与会者的问题。马里前总理凯塔先生也作为演讲嘉宾出席研讨会。凯塔发言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在讲话中说到了‘中国威胁’，你们欧洲国家都很富有和强大，而我们非洲国家是相对贫穷和弱小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中国威胁，相反我们非洲很爱中国。”他用亲身经历列举中国对非洲的有效援助，用事实证明中国和非洲的友谊和合作。针对有的西方政客“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的谬论，凯塔明确指出“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利用资源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合作与共赢精神，这与殖民主义

者掠夺非洲资源有本质区别。”凯塔的发言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给我后来的演讲和解答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和鼓舞。

2011年5月，外交学会邀请凯塔访华，我有幸全程陪同。在参观访问中，他特别认真地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凯塔说， he 现在是马里联盟党主席，回国以后将积极准备参与2013年的总统竞选。马里这些年来发展缓慢，如能当选总统，一定会努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2013年8月，他果然成功当选。选举获胜后，他亲自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我虽然没有应邀前往，但他派来的新任驻华大使抵京后第二天就约见了。大使说，总统指示他到北京后，应该尽快会见他的好朋友。大使带来凯塔总统的亲切问候和友好情谊令我永志不忘。非洲人坦率、朴实、重情义，这也是我非洲情结的根之所系。

时任马里总统科纳雷是位有学者风度的非洲政治家。1992年4月当选为马里总统，1997年连任。2002年6月卸任后于第二年至2008年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著作颇丰。科纳雷总统对中国有颇深的了解，在谈及中国政治、历史、改革开放时，如数家珍，细致准确，而且有独到见解。他十分重视中马友好合作，在许多具体合作项目上亲自关注并鼎力支持。他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毫不含糊，在反对台湾加入西非发展银行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使台湾的阴谋终成泡影。科纳雷总统对华友好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

贝宁总统克雷库盛赞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

奴隶贸易和殖民压迫给非洲人民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以后，也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掠夺。只有中国把非洲视为兄弟，平等相待，从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尊重非洲国家和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贝宁总统克雷库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流露出特别赞许之情。他在访华时多次强调，中国是贝宁和非洲人民最真诚的朋友，你们长期以来真诚，帮助非洲人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发展和进步，非洲人民热爱中国，贝宁人民热爱中国人民。

我曾有幸多次参加邓小平同志会见来访的非洲国家元首活动，他充满感情的深入谈话总是令非洲领导人深受感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经济上按西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药方”进行结构调整，但总是问题多多。有的非洲国家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有的也想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但都成效不大。非洲国家在苦苦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1986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克雷库时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谈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克雷库总统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克雷库的穿着也深受中国的影响，每一次来中国访问，他都要订制几套中山装或中式军便服。在贝宁国内的重要活动和出国访问时，他总是身着中山装或中式军便服。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同志推心置腹地与克雷库交流治国理政的体会，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鼓励贝宁和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久后，克雷库就对贝宁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使国家政治和经济出现了积极变化。

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中国从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但是愿意与非洲国家交流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机遇。

这些年来，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本国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经济建设方式进行反思，开始“向东看”，希望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借鉴中国快速发展的方式方法，以实现本国的振兴。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互访交流空前频繁，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成为重要内容。2017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非洲的 50 多个政党积极与会。双方通过深入交流，分享治党治国经验，深化相互认知，谋求合作共赢。许多非洲国家派高级别官员和专家到中国考察学习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有的国家要求中国派专家帮助它们制定具体的经济开发区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培训干部。

“要想富，先修路”“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还有“一站式服务”等许多中国改革开放的实用经验在非洲大陆受到青睐，并在许多国家开始付诸试验。中国在实践中意识到“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和无农不稳”的道理，注重全面和均衡发展。非洲国家也正在努力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非洲制造”和商品流通。非洲许多国家希望把“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国的发展战略对接。非洲在汲取世界经验，谋求发展。

邦戈总统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服中国”

我在加蓬常驻五年半，与奥马尔·邦戈总统有比较多的接触，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的情谊。邦戈总统曾十多次访问中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服中国，并把毛主席视为偶像，总统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他与毛主席的合影。中国派驻加蓬的

医疗队经常去给邦戈总统做中医保健推拿，我有幸多次担任翻译。在理疗前后和一个多小时的治疗过程中，邦戈总统总是问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也侃侃谈论他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在国际事务中，他一贯支持中国。比如在反对西方炮制的涉华人权提案问题上，邦戈态度十分明确，他特意指示加蓬外交部，凡是有关涉华提案，不用请示，一律支持中国。国家关系基础在人民，未来在青年，而关键在领导人。非洲领导人对中国的信任和热爱在中非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摩洛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毫不动摇

摩洛哥 1956 年获得独立，1958 年紧随埃及之后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二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我是中国驻摩洛哥的第十二任大使。我到任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2003 年 6 月底，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全球妇女论坛峰会”。当时中国国内正闹“非典”，无法派团参议。台湾当局趁机钻空，派出以“新闻局副局长”为首的代表团。会议前一天，我从摩洛哥朋友那里得到信息，立即找到摩洛哥外交部和妇女组织负责人做工作，要求阻止台团与会。摩方表示，此会系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作为民主开放和外交多元的国家，台湾代表团已经受邀并在参会途中，完全拒绝台湾参会难度太大。我从两国关系的历史和全局高度出发，强调摩洛哥是主权国家，国际会议在摩洛哥领土上召开，就必须尊重摩洛哥的意愿和原则，而摩洛哥历来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立场的。我还用敏感的西撒哈拉问题，明之以理、动之以情、晓以利害，说服摩洛哥外交部和妇女组织领导，批驳了国际妇女组织头头（法国人）的谬论。

最后，经过反复交涉和协商，特别是在摩洛哥最高层的干预下，摩方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台湾代表团入境。摩洛哥外交部、海关、边防统一行动，把台湾代表团挡在卡萨布兰卡机场 20 个小时，迫他们乘飞机经阿姆斯特丹原路返台湾。在会场里，“中华民国”的伪旗被摘掉，换上了五星红旗。那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摩方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原则。后来，我看到台湾报纸有一则题目为《世界妇女高峰论坛风波，中国驻摩大使捣鬼》的报道说，“‘外交部’经过连日查证，李雪津一行被摩洛哥海关留置一天多后被迫离境，背后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程涛一手主导。”该报道还说，“程涛对台湾‘恨之入骨’，早在任中共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时就对台湾打压毫不手软，在非洲各国挖我墙角不遗余力。”

其实台湾阴谋之所以破产，主要是摩洛哥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坚持“一个中

国”的立场。第二年又在摩洛哥召开一次重要国际会议，摩洛哥外交部在会前 3 个月就通知其驻各国使领馆停发台湾人进入摩洛哥的所有签证，包括旅游签证。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摩洛哥总有上乘表现，给“台独”势力当头棒喝。

结 语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非洲朋友之所以积攒深厚的对华感情，都缘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兄弟坚定的支持和持久的友谊。非洲人民珍视传统，人们往往习惯于“在大树下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非洲人民重情重义，特别遵从祖辈的教导。非洲老一辈领导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世代传承，而中国人民和历届领导人对非洲的友好一以贯之，共同构成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坚实基础。

中国与非洲：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李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我党 100 年辉煌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我党立足当前、开创未来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百年辉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道路，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一百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是在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想学习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先后在南昌、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起义失败后

^{*} 作者简介：李强民，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曾任中国驻乌干达、赞比亚大使（北京 100020）。

的剩余革命力量，退居到井冈山一带经济落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保存和积聚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最终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作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最有可能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路。沿着这条路，经过 20 多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如何在一个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脱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场考验，世界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难探索，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紧紧扣住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果断地将全国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部署，开辟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简单套用苏联模式，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吸收、运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创新出来的一条发展道路。这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所走过的路，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洞察世界发展趋势、顺应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中国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成功密钥”，也是一些非洲国家近年快速发展的经验之谈。我曾经长期在非洲工作，先后出使过乌干达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还曾在外交部非洲司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司领导。2001 年出使乌干达之前，我专程请教了时任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大使，他曾担任过外交部分管非洲、中东事务的副部长和驻埃及大使。见面时，杨大使给我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1989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乌干达领导人穆塞维尼，这是穆塞维尼 1986 年夺取政权后首次访华。杨大使作为外交部主管领导陪同会见。宾主落座后，小平同志直接问道“乌干达搞的啥子主义？”翻译一时没听

明白，就没有翻。小平同志又问了一句“你们搞的啥子主义？”翻译仍然没有反应。小平同志意识到，可能是翻译没有听懂他的四川方言，就补充道“你问他是搞的社会主义还是搞的资本主义？”翻译过后，穆塞维尼略作思考，回答道：“我们搞的是乌干达主义。”小平同志听了后，连连称赞“对头！对头！”有了这样的开场，宾主相谈甚欢。小平同志向穆塞维尼详细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教训，这次会见还录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杨大使讲了这个故事后，叮嘱我：穆塞维尼是非洲年青一代政治家的杰出代表，他有思想、有抱负，能力很强，希望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乌干达和非洲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把国家治理好，你当大使期间，应同他多交往。根据杨大使的指点，我到任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发现他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很感兴趣，我就有意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国内先后派出多批专家为乌干达执政党培训，从党的建设、组织动员、经济发展、反腐倡廉、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等诸多方面，为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做的，成效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等等。这些系统培训为加强乌干达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民生水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乌干达作为东部非洲的内陆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其从自身国情出发，实行了独特的政党体系（运动）、鼓励民族和加工工业发展、促进各部落之间和谐相处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乌干达成为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稳定的非洲国家之一，在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穆塞维尼连续六次当选总统，成为非洲历史上极个别连续任职时间超过 30 年的总统之一。穆塞维尼总统为非洲统一建设和中非关系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同总统本人也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并不拒绝、排斥我们党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政党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世界上最开明、最善于学习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愿意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并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指教！”^①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既避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又防止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定不移地沿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直走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夙愿。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我认识的百年南非共产党两位总书记*

舒 展

中国共产党和南非共产党^①（简称“南非共”）不愧是兄弟党，成立日期期间隔仅7天，2021年7月共庆百年华诞。借南非共第二副书记克里斯·马特拉科的话来说，两党的背景既相似又不同：都出生于第三世界，面临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挑战；两者以各自方式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升华作出巨大贡献。^②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南非共产党重申“把人民置于首位，置于利润之前，置于利润之上”的世纪纲领。

笔者曾先后结识南非共的两位领袖，即第十一任总书记克里斯·哈尼和第十任总书记乔·斯洛沃。他们都是十几岁便投身民族解放斗争，都实事求是地认为南非不能照抄别国“作业”，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不能分割，首先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种族平等新南非。两人均在去世前几周选定墓地，哈尼是葬于当地白人墓园（South Park Cemetery）的首位黑人，斯洛沃是长眠索韦托黑人公墓（Avalon Cemetery）的首个白人。他们的葬礼均有数万民众送行，不分种族。

英年早逝的哈尼

哈尼（原名 Martin Thembisile Hani，1942—1993年）是富有魅力的南非共领袖。

* 作者简介：舒展，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大使（北京 100020）。

① 南非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21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开普敦普莱因街（Plein）20号举行。1953年被迫转入地下。1994年以来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组成三方联盟执政至今。<https://www.sacp.org.za/content/about-sacp>;
<https://www.sahistory.org.za/article/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sacp> [2021-08-05].

② Ni Yanshuo, “Chinese and South African Scholars and Officials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Review*, June 17, 2021.

他出生于原南非第一个黑人家园特兰斯凯 (Transkei, 1994 年归建新南非东开普省) 中部的贫苦山村萨巴勒勒 (Sabalele)。父亲在开普敦等城市打工, 参加反种族隔离斗争。哈尼从小爱学习, 3 年学读完小学, 最终毕业于黑堡大学 (University of Fort Hare)。15 岁即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 流亡国外近 30 年, 投身于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和津巴布韦解放战争, 成长为非国大武装力量“民族之矛”的参谋长。1990 年 4 月, 哈尼回国, 并于 1991 年 12 月接任南非共总书记。1993 年 4 月 10 日, 复活节周末的上午, 他在约翰内斯堡东郊博克斯堡的多恩帕克 (Dawn Park, Boksburg) 自家门前惨遭白人保守党议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 (Clive Derby-Lewis) 指使的波兰裔移民杀手贾努斯·瓦利 (Janusz Waluś) 暗杀, 胸部和头部连中数弹。警方在凶手家搜到一份暗杀对象名单, 9 个人中, 哈尼紧随曼德拉和斯洛沃, 排名第三。^①

1992 年春, 哈尼总书记率团访华。笔者当时参加了接待工作, 第一次见到这位非洲英雄。两党在万寿宾馆会谈, 哈尼先请中方主谈人介绍中方人员, 笔者被介绍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研究人员。哈尼马上提出他要去一下洗手间, 并示意我带路。刚出会谈室的门, 他一脸严肃, 近乎质问地说, “我们两个兄弟党会谈, 你来干什么?” 我此前已多次参与接待外国共产党的工作, 理解并佩服其高度的警惕性。我告诉他, 那只是我的另一个身份, 并曾以此身份访问过南非, 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他这才释然一笑, 转身返回会谈桌旁。

时隔半年, 笔者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再访南非, 哈尼对我这个交流协会研究人员却格外热情。两党在约翰内斯堡南非共总部几次会谈, 交流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形势, 也谈到了中南两国各自国内形势。哈尼展开一张大地图, 给我们介绍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当时 (1992 年 8—9 月) 动员民众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计划。

他既是那种有独立主见的领导, 同时又豁达开朗, 平易近人, 总是面带微笑、张开双臂欢迎朋友, 颇受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拥戴。他亲自驾车带我们回其家乡, 先是应邀出席白人大资本家的午餐会, 其即席讲演抓住当时白人最担心的话题, 向他们保证非国大执政后绝不会重复其他非洲国家无偿没收白人资产的激进做法。晚上, 他又充满激情地向父老乡亲阐述非国大通过与白人政权谈判避免过大的牺牲, 呼吁百姓超越部落和民族界限创建统一民主的新南非。他连夜开车送我们去伊丽莎白港 (已更名为曼德拉市), 一路上他有问必答, 滔滔不绝, 很少用大词长话诠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而是详细阐述南非共产党将为劳苦大众

① Janet Smith & Beauregard Tromp, *Hani: A Life Too Short, A Biography*, Johannesburg: Jonathan Ball Publishers, 2009, pp. 253 - 254.

跳出苦海做些什么。凌晨我们抵达目的地，清早他又引见长期在南非国内坚持斗争的非国大新任总书记拉马福萨（现任南非总统）同我们座谈。两位总书记随后携手前往西斯凯（Ciskei）黑人家园指挥群众斗争^①。临行前，哈尼与我们告别，用中文同我们说“再见”。可惜，1994年上半年笔者去南非“游学”时，只能去哈尼陵墓献上花篮。

鞠躬尽瘁的斯洛沃

乔·斯洛沃（原名 Yossel Mashel Slovo；1926—1995 年）长期担任南非共和非国大的主要领导，非国大/南非共不同时期的许多纲领都有他的心血，如 1955 年《自由宪章》、1962 年南非共纲领《争取南非自由之路》、1993 年《临时宪法》、1995 年《重建与发展计划》，等等。曼德拉说过，乔不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而是起而践行的革命家；既是“民族之矛”武装的司令，也是制宪谈判的战略家。

笔者曾翻译过他的两篇文章，1990 年初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吗？》和 1992 年的《谈判：妥协的余地何在？》^②，都是为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现实灵活地应对大变局提出的战略性决策建议。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全球穷苦大众追求的理想，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他更强调民众的经济解放，如果南非大多数人只是每隔几年有权投票选择执政党，而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谈不上获得了民主权利。

第二篇则首创在新宪法中设立“日落条款”，提出在一定限期内通过民族团结政府形式分享权力的主张，不仅打破了非国大等民族解放组织与白人和“黑人家园”政权谈判的僵局，而且可以规避地方势力和白人政权企图分裂国家和暴力顽抗的风险。

当时笔者却百思不得其解，以为南非共和非国大也要像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一样，为谈判成功不惜放弃多年的斗争目标。1992 年往访时，我曾当面请教斯洛沃。他说，目前我们只能同资本主义“共处”。邓小平同志为统一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方针，给我们的启发很大。中国共产党能让资本主义在港澳台再留 50 年，为何就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在南非再活 100 年呢？届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完全有能力战胜或改造资本主义。

1993 年 8 月，身患骨髓癌的斯洛沃访华，通过考察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夫妇有备而来，全神贯注听介绍，回住处立即整理笔

① 1992 年 9 月 7 日，非国大三方联盟领导人率 8 万群众游行进军西斯凯黑人家园首府比绍（Bisho），欧帕·约书亚·果佐（Oupa Joshua Gqozo）军政权开枪阻止，导致 20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史称“比绍惨案”。

② Joe Slovo, “Negotiations: What Room for Compromise?” *African Communist*, No. 130, Third Quarter, 1992, pp. 36–40.

记，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农村改革、城乡各类所有制的区别等，每逢两人一时无法达成共识，宽厚的斯洛沃便率先停止争论。^① 笔者为他们与经济学家董辅初关于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讨论做翻译。斯洛沃以参观考察的一家温州空调厂为例，认为原建厂几个人发股票招股东，不宜再称之为集体公有制，必须从理论上澄清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性质。他说南非共产党一旦掌权后，仍需要某些资本主义所有制，以便它们继续为经济发展作贡献，这也是为社会主义改造打基础。董先生回应，社会主义改造有不同学说，大家需要通过实践反思社会主义，更新认识。他俩都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不能生搬硬套。^②

1994 年上半年，笔者在南非几次见到斯洛沃，他一连几个月忙于非国大三方联盟的竞选，奔波在各个省讲演，嗓音嘶哑。4 月 29 日傍晚，非国大得胜后两天，我们登门祝贺，坐在约堡北郊他家后院的平台上等候多时才见他回来。斯洛沃一边和我们畅谈日后的设想，一边咳个不停，半个小时的谈话被 7 个电话打断。离别时，他抓住我们的双手，连连说还要访华。他坚持要其两个卫士送我们回金山大学，话音未落，客厅电话又响起，他两次转身道别。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③

后来，斯洛沃出任南非住房部长，10 月下旬便在自由州省的博察贝洛 (Botshabelo) 召开峰会，政府与银行、民间组织、工会和其他社团签约一起在 5 年内为穷苦大众建造百万套经济适用房。当年底，斯洛沃在世的最后几天还于家中病榻旁召集会议。1995 年 1 月 6 日，斯洛沃不幸以疾卒。我从北京委托在南非的同事送去花篮，据悉犹太葬礼和墓碑前不兴放花圈。

笔者 2001 年调到驻南非使馆工作。翌年 1 月 5 日，斯洛沃的遗孀海伦娜·多尔尼 (Helena Dolny) 陪着我们到索韦托东南的阿瓦隆公墓，我还是带了一个素白的花篮。斯洛沃的陵墓前面有块石坪，一侧边缘做成不规则形，寓意逝者的生命并未终止，瞩目未竟的事业进程。石坪中间成对角线刻一道赤褐色浅沟，表示斯洛沃革命生涯的轨迹。墓碑右上角也不规则，突出镰刀斧头的雕塑。墓碑下方刻着斯洛沃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在许多人的抚摸下略有退色。南非黑人习俗是在墓碑上摆放石子，海伦娜从车里拿来几枚从古巴带回来的石子。再过几天，1 月 8 日恰逢非国大成立 90 周年，因此祭扫先烈墓地的人不少。几个黑人青年走来，也给斯洛沃的墓碑上放了几颗石子。他们说，凭吊英雄是激励自己的最好方式。

(责任编辑：李若杨)

① Li Liqing, "Remembering Joe Slovo's Third Visit to China," *The Thinker*, Vol. 67, Quater 1, 2016, pp. 58 - 60.

② Shu Zhan, "Joe Slovo: A Brilliant Teacher," *CHINAFRICA*, May 1995; a revised version included in *Slovo: The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Ravan Press, South Africa, 1995, pp. 214 - 216.

③ Ibid.

**Brush Talks from Chinese and African Ambassadors and Scholars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Important Speech on July 1st**

[Ethiopia] *Teshome Toga Chanaka et al. /Translated by Wei Baige and Ling He*

Editor' s Note: The year 2021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 In an important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PC ,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great path we have pioneered , the great cause we have undertaken ,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gained by the CPC over the past century , and profoundly expounds why the CPC was successful in the past and how it can continue to succeed in the future. He pointed out the tremendous importance of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PC in the past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e also systematically answered a series of major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re of leadership , value pursuit , theoretical guidance , strategic support , external environment , and sources of streng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the national cause. This has provided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a clear direction and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their journey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important speech on July 1st is of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is well received at home and abroad. Africa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armly congratulated the CPC on its centenary and spoke highl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important speech on July 1st. This journal hereby invites 8 Chinese and African ambassadors , experts and scholars , including Teshome Toga Chanaka , Ethiopian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Zhou Yuxiao , Ambassador for Affairs of FOCAC to write o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important speech. The authors review the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 and look ahea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an aim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s: Teshome Toga Chanaka , Ethiopian Ambassador to China (Beijing

100600) ; Laston Mukaro, Senior Lecture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Harare) ; Banwo Adetoro Olaniyi, Lecturer of University of Lagos, Nigeria (Lagos) ; Zhong Weiyu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Bureau IV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Researche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Beijing 100860) ; Zhou Yuxiao, Ambassador for Affairs of FOCAC and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Liberia and Zambia (Beijing 100020) ; Cheng Tao, former Director – General of African Department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Mali and Morocco (Beijing 100020) ; Li Qiangmin, Secretary – General of the Chahar Institut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Uganda and Zambia (Beijing 100020) ; Shu Zh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Eritrea and Rwanda (Beijing 100020) .

Translators: Wei Baige, PhD candidate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45) ; Ling He, Editor of *Journal of China – Africa Studies* (Beijing 100101) .

**Yan’ an Spirit,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Yan’ an Spirit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Wu Chuanhu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Yan’ an Spirit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Yan’ an from July 29 to August 1, 2021. Ambassadors to China from 11 African countrie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rican Union to China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frican students attended the forum. The African ambassadors to China spoke highly of Yan’ an Spirit, believing that the success of Yan’ an represents China’s success, and that Africa also needs Yan’ an Spirit. They commended the achievements scored by China in poverty elimination, remarking that China’s poverty elimination i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that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poverty reduction. Speaking highly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 they noted that strong leadership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hat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exchanges with the CPC on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forum attendees applauded the thinking of Chinese leaders, believing that the great cause needs the guidance of great ideas and that Afric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